

大唐西市 丝绸之路与唐文化研究丛书

历史上的
大唐西市

LISHISHANGDE DATANGXISHI

王彬 主编
张沛 撰稿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上的大唐西市

王 彬 主编

张 沛 撰稿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上的大唐西市 / 王彬主编.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24 - 08617 - 1

I. 历… II. 王… III. 商业史 - 长安市 - 唐代 IV. F7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9128 号

历史上的大唐西市

主 编 王 彬
撰 稿 张 沛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11.25 印张 9 插页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617 - 1
定 价 38.00 元

《历史上的大唐西市》编辑委员会

顾 问：张文彬

主 任：吕建中

副主任：李中航 胡 戟 王 彬

委 员：张 沛 张 娟 张 印

谢 伟 李 凯 邵 鹏

主 编：王 彬

撰 稿：张 沛

设 计：邵 鹏

摄 影：任 超

序

张文彬



序

盛夏，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女士将一本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的《历史上的大唐西市》书稿搁在了我的案桌。读罢，甚有感触，遂草成几点感言，向诸位专家和读者求教，且为代序。

唐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其规模之宏伟、布局之严整，对东亚乃至世界各国都城建设产生之影响都是绝无仅有的。长安城中四方辐辏，商贾云集。而大唐长安西市则是唐都长安中最为繁华的具有国际性质的商贸集市。其鼎盛时期时人称之为“金市”，人口稠密，熙熙攘攘，中外客商云集，尤以西域胡商居多（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名副其实的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中心。另一方面，西市又成为唐王朝近三百年兴衰史的缩影。唐中叶经“安史之乱”及随后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辉煌的大唐渐渐走向衰落。尤其是唐末社会动乱，群雄纷起，觊觎皇权的割据势力屡屡威胁大唐安危，先是被封为“岐王”的李茂贞于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借机“遂入长安，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资治通鉴·唐纪七十六》），使长安城遭到严重破坏。接着在天佑元年（公元904年），降唐的黄巢旧部、宣武节度使朱温统军进入长安，迫唐昭宗东迁洛阳，并将唐长安建筑尽行拆毁，“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至此遂丘墟矣。”（《资治通鉴·唐纪八十》）。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从此灰飞烟灭，西市也未能幸免于难。到元代也只剩下“故市坡”这一地名而已（《类编长安志》）。

长安西市位于唐长安宫城西南，其地在今西安西南方1公里多的糜家桥与东



桃园村之间。在唐长安城规划布局中，约占两“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四周有围墙，并有市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唐长安城进行了相关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明确了西市的具体位置和范围，使我们第一次对西市内的布局等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初步认识。2006年对西市遗址的发掘，则给我们研究西市提供了新的资料。

历代文献中对西市有零星记载。而最早记述西市的则首推唐人韦述所著的《西京记》。《西京记》今已佚，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太平御览》所引述的只言片语。《御览》卷一九一《市》云“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长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铭，云‘百年为市，而后为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时百余年矣”。后来韦述又在其所著《两京新记》卷三“长安县所领”内“西市”下云“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讹言反说，不可解说。”唐刘肃撰《大唐新语》、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及李白等诗人的诗篇里都有生动的记述。以后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及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等均对西市有相应的记载。而对西市内容有较多充实的是清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但受历史的局限，其所采用的资料多局限于传世文献，仅有少量来源于碑志资料。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资料大量被发现，为进一步研究西市提供了契机。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阎文儒及日本学者妹尾达彦（《长安の都市計画》）等先生先后或著专文，或综合论述，都对西市进行了研究。而阎文儒、阎万钧和李健超先生则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撰成《两京城坊考补》、《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对徐松先生的著述进行了大量补充，为研究唐代东西两京的城市风貌、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西安城市建设的发展，大唐西市博物馆应运而生。为配合博物馆展陈方案，大唐西市博物馆特约张沛先生主笔撰成了《历史上的大唐西市》一书。作为近年来系统研究唐长安西市的一部力作，颇具特色，甚受启迪。

首先，内容宏富，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博。大唐西市作为大唐帝国都市的商贸





中心，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杳然，要恢复历史原貌，必然要对其历史沿革、发展变迁、管理制度、运营模式、市井风貌、重大事件乃至历史人物等本体内容做出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深层分析和深入研究，显然这是有相当难度的。著者不畏艰难，在充分运用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吸收了有关唐长安西市的考古资料，还借鉴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很下了一番功夫。全书不仅从宏观上对西市做了介绍，而且对市场管理、经营、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最后以大事记略结束，几近于为大唐西市编订了一部编年史。其对唐史研究，特别是对唐都长安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实事求是，研究问题比较扎实。书中虽大量引用文献典籍材料，但并不冗繁。“无夸张之意，有扎实之功”，对于资料的取舍很有分寸，对相关事不做任何演绎，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尽力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比如在西市究竟有多少行这一问题上，韦述《两京新记》云，长安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宋敏求《长安志》云，东市“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杨宽认为此“二百二十行”不确，“都是大概的数字，无非说明各种行业之多”（《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等等。张沛先生经过分析，认为杨宽先生的观点可信。至于一百二十行究竟是什么，文献中直接能查找到的记载不过十二行。这仅占西市总行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有丝织业、珠宝业、旅舍业等，丝业又分绢行、丝帛行……夜间还开设夜市，其繁华程度犹如如今之北京王府井也。该书还依据碑石文献资料，对唐代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中市的行类做了系统搜集排比。这些城市中所出现的行，在当时最大的市中或多或少都能有所体现。通过这些旁证，使我们对西市庞大的行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又如第八章《人物志》中有关窦义、宋清、杨潜、王承福等人的志传，都很得当。显然，作者阅读查考了许多大家的著述和传奇；有些史料虽取材于宋人编撰的《太平广记》，但所述史实却真实可信，值得参考。另外，对西市两个放生池的说法，作者去伪存真，提出“法成所掘之池与太平公主所掘之池并不是一回事。法成所掘之池在西市西北方，而太平公主所掘之池，时间、地点均已难详”的这一让人比较能够接受，也更加合乎情理的论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再次，该书图文并茂，采用照片、图片等近百幅，为书增色不少。同时某些



资料，如胡王泼寒瓷塑的性质等，国内学界所知者为数并不多。尤其是大量碑石文物资料的运用，极大地充实了传世文献中对西市相关领域记载的缺失。

总之，《历史上的大唐西市》以一个集市作为研究主题，通过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对大唐“西市”作了全面描绘，对我们重新认识“西市”有很大的帮助，于类似课题的研究也是有相当的启示的。

300余年间鲜活且盛大的片段，被遗落在1300多年来时间溅起的尘埃之下；整整一个时代的辉煌，今天重新掘开，尤显沉重，而对其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如《历史上的大唐西市》也仅是一个开始。

今天，大唐西市作为省市两级重点建设项目，在欲使之成为我国西部文物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新亮点的战略格局下，对其本位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大唐西市作为封建时代成熟的自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亦可资借鉴。甚至，作为当时世界级的商品集散地，运行几百年而井然有序的持续发展所显示出的充沛的市场活力，稳定有效的监管运营机制，对今天世界经济无疑也有其可资借鉴之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的意义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合上厚厚的书稿，西域的驼铃、大唐盛世西市的喧嚣却不绝于耳。愿更多的有识之士和热心者加入到这个研究队伍中来，也诚愿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为我们的民族复兴增添更多的异彩。

2009. 8. 6

（本文作者为原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目 录】

一 大唐西市概况	1
(一) 历史文献中记述的西市	3
(二) 考古发掘中见到的西市	7
二 大唐西市的管理机构	15
(一) 西市署	17
(二) 平准署	23
三 大唐西市的行肆店铺	25
(一) 行	27
(二) 肆	31
(三) 店铺	34
(四) 其他	40
(五) 业者种种	42
四 大唐西市的商业及金融业	47
(一) 西市商人的地位	49
(二) 西市商业的发展	51
(三) 西市的货币流通	54
(四) 西市的金融事业	59
五 大唐西市与胡人胡商	63
(一) 唐代长安多胡人	65
(二) 长安胡人多聚居于西市及周围坊中	67
(三) “西市胡”的经营活动	75
六 大唐西市与丝路贸易	81



	(一) “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城开远门	83
	(二) 丝路贸易的最大集散地——长安西市	87
七	大唐西市的社会生活	95
	(一) 服饰	97
	(二) 饮食	101
	(三) 娱乐活动	109
八	大唐西市人物志	117
	(一) 人物传	119
	(二) 人物简介	132
九	大唐西市七问	141
	(一) 唐长安城中除西市及东市外，还有哪些市？	143
	(二) 西市所占的“两坊”为哪两坊？	145
	(三) 西市市门开闭与开市、闭市是否同时？	146
	(四) 西市究竟有多少“行”？	147
	(五) 西市何以比东市更为繁盛？	150
	(六) 处决人犯的“独柳”在西市什么地方？	152
	(七) 西市两个“放生池”是怎么回事？	153
十	大唐西市大事记略（618—904）	157
	附录：唐纪年表	164
后	记	171



一 大唐西市概况

(一) 历史文献中记述的西市
(二) 考古发掘中见到的西市



大唐西市作为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商贸市场，作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实际起点和当时的世贸中心，随着“大唐西市”建设项目的开发和“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建成，特别是“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工作的启动，“大唐西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文献对“大唐西市”研究是怎样记述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西市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其所见到的西市是个什么样子？以下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对大唐西市概况予以简述。

（一）历史文献中记述的西市

唐长安城东、西两市始设于隋初筑大兴城之时。东市在皇城东南方，始名都会市；西市在皇城西南方，始名利人市。岑仲勉先生校韦述《两京新记》，于“隋曰利人市”下注云“‘利人’本名‘利民’，韦避唐讳改。”^[1]卷3第49页校勘记^[-]按“利民”，即有利于民之义。语出《逸周书·王佩》：“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隋筑大兴城时，于坊市命名，皆有所本，并寓深义。唐为太宗李世民讳，改“民”为“人”，是情理中事。故岑说甚是。据《唐会要》“户部尚书”条：“武德元年（618），因隋为民部尚书，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二十日（按：即太宗去世第二十天）改为户部尚书。”^[2]卷58第1010页盖高宗李治即位不久，始为父讳。以此推之，利民市依方位改为西市（或先改名利人市，后改称西市），亦疑在高宗即位之初。

尽管“大唐西市”在中外历史上一度非常有名，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史籍中记述得很少。以两《唐书》为例，直言及长安“西市”的仅14处（内容重复的除外），其中灾异5处，刑人2处，事件只有7处。而具体涉及长安城内坊市的著述，只有唐开元年间（713—741）韦述撰写的《西京记》及《两京新记》，北宋人宋敏求熙宁九年（1076）所著的《长安志》，元人李好文至正四年



(1344) 撰写的《长安志图》，以及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所著《唐两京城坊考》。其他各书，诸如清代的各本《陕西通志》、《西安府志》及长安、咸宁二县县志，于西市虽偶有记述，大都因袭旧说，缺少新意，无甚足述。

韦述《西京记》云：

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长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铭，云“百年为市，而后为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时百余年矣。（《御览》卷一九一《市》）^[3]第74页

韦述《西京记》已佚，以上有关西市的一段记述系据《太平御览》辑录。虽嫌简略，却是迄今所见对唐长安城西市最早的记述。

不久，韦述在其《两京新记》卷三“长安县所领”内“西市”下云：

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糴货卖之所，讹言反说，不可解说。（《新记》残卷）市西北隅有海池，长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铭云“百年为市，而后为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时，百余年矣。（《御览》卷一九一）池侧有佛堂，皆沙门法成所造。市署前有市令载敏碑，蒲州司兵徐彦伯为其文也。（《新记》残卷）^[1]第4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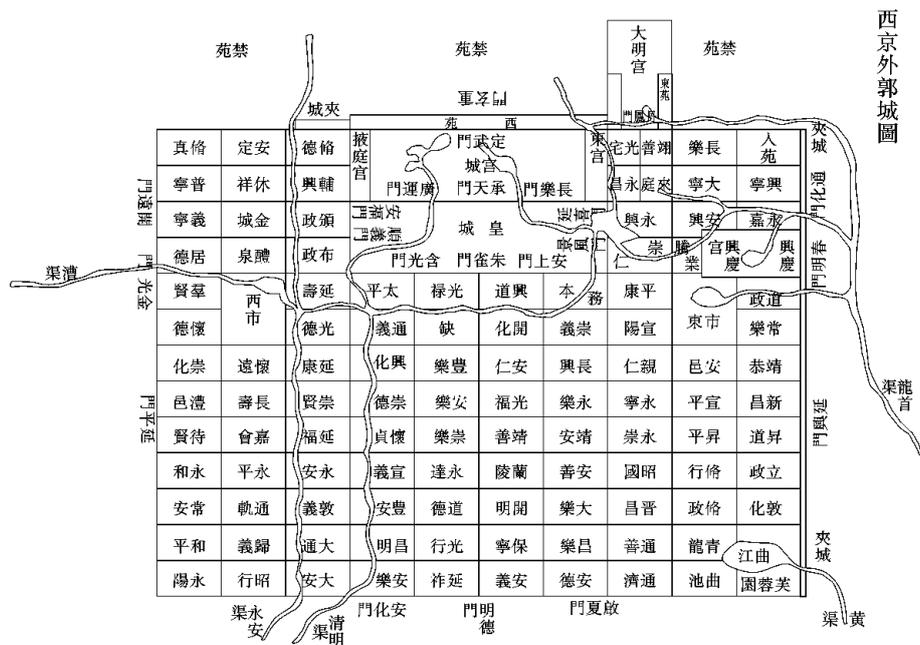
《两京新记》亦佚。此据最新辑校本所录。将现存的《西京记》及《两京新记》所记西市内容加以归纳，可知主要有以下六点：一是西市隋曰利人市（已如前述）；二是西市南北占两坊之地；三是市西北隅有以为放生之所的“海池”，其侧有佛堂，皆为长安间（701—705）僧人法成所造；四是西市有市署，隶太府寺；五是市署前有市令载敏碑，并有“大衣行”；六是西市内店肆制度如同东市（按：今所见《两京新记》卷二“东市”条属“制度”者唯“平准署”三字。^[1]第20页是西市亦有隶于太府寺的平准署。）韦述所记西市实况，今可见者，仅仅如此。

宋敏求《长安志》云：

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

计。市西北有池，长安中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池。放生池。平准署。独柳。刑人之所。^[4]卷10第7页

从这段录文可知，《长安志》对西市的记述，仍是以韦述所记为蓝本的。所新增者，一是将长安、万年二县民户做了比较，说明西市人口比东市为多（即所谓“浮寄流寓，不可胜计”）；二是说西市有“独柳”其地，为“刑人之所”。较为珍贵的是，《长安志》对东市记述稍详。由于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因此，东市中如下记述可补西市之阙：一是“东西南北各六百步”，于此可知西市



唐长安城坊市分布图

（采自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的规模。二是“街市内货材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于此可知西市商业繁华亦是如此。三是“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文）〔又〕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有口（焉）〔马〕止号行，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于此不仅可知西市胜于东市，且得知西市何以胜于东市的缘故。四是“当中东市局，次东平准局”，于此可知西市亦是市署居市之中，平准署在市署之东。^[4]卷8第12页



北宋时吕大防曾刻《长安图记》，元人李好文以之为底本，略加删补，著成三卷本《长安志图》。吕刻已佚。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将宋敏求《长安志》和李好文《长安志图》校订后一并收入了《经训堂丛书》。民国二十年（1931）长安县志局重印的毕沅“新校订”三卷本《长安志图》卷上“〔唐〕城市制度”一页内，画有三个简图：一为“一坊之制”图，作“田”字形；一为“皇城南坊之制”图，作“日”字形；一为“居二坊地”图，显为东、西两市图。旁注“四街八门”，图作“九宫格”，内呈“井”字形，其下文曰“市制：四面皆市人居之。中为二署，盖治市之官府也。旧图（按：指吕大防图）全画坊市制度，今间小，不能记，容别画一坊之制以见其余。”^[5]卷上第9页看来李好文因他的书本空间不如碑版大（即所谓“今间小”），遂将吕大防旧图中比较繁杂的《唐京城坊市图》有意省去，而代之以这三个（指“田”字形、“日”字形、“井”字形）简图了。尽管如此，李好文《长安志图》中所绘“九宫格”（即“井”字形）图及旁注之“四街八门”一语，为厘清西市的形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李好文《长安志图》之前成书于南宋时期的程大昌《雍录》，虽对唐长安城坊有所考订，但不及西市。此后毕沅所编的《关中胜迹图志》，因其旨在图示“胜迹”，并非为了考古，对西市亦未予重视。有清一代，真正对西市比较关注的是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此书依据历史文献，特别是唐人笔记小说，对《长安志》中所记西市情况做了较多的增补。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外郭城”内“醴泉坊”下云：

次南西市。隋曰利人市。《旧〔唐〕书·杨贵妃传》（文略）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市署。署前有市令载敏碑，蒲州司兵徐彦伯为其文也。平准局。衣肆。沈既济《任氏传》（文略）鞮辔行。《逸史》（文略）秤行。窦家店。《乾埽子》（文略）张家楼。《会昌解颐录》（文略）景先宅。《霍小玉传》（文略）放生池。（文略）独柳。刑人之所。按西市刑人，唐初即然。贞观二十年，斩张亮、程公颖于西市。《旧〔唐〕书》《肃宗〔本〕纪》、《王涯传》又言子城西南隅独柳树。盖西市在宫城之西南，子城谓宫城。^[6]第117—118页



徐氏所记，除逢录韦、宋二书之外，新增了“衣肆”、“鞞警行”、“秤行”及“窰家店”、“张家楼”、“景先宅”等行肆店铺。另外，从所引《旧唐书·杨贵妃传》知道有“西市门”，从所引《乾杆子》知道西市秤行之南曾有众秽所聚的“小海池”及治生能手窰葺其人，从《霍小玉传》知道西市有寄卖衣物的“寄附铺”，还从其对“独柳”的考证，知道了唐代这一刑人之所的具体位置。

道光三十年（1850），程鸿诏读徐氏《唐两京城坊考》后，为之作“校补记”，增补了若干新的内容：一是据《续玄怪录》新增了“麸行”，据《乾杆子》新增了“绢行”，据《玉堂闲话》新增了“卖饮子家”，据《国史纂异》及《纪闻》新增了“酒肆”，同时，还据《续玄怪录》新增了“波斯邸”，据《原化记》新增了“卜者李老居”，据《逸史》新增了“西市北坊新宅”；二是对“市署”和“鞞警行”做了补注，如据《朝野僉载》说“魏伶为西市丞”，据《逸史》文义，推测鞞警行“有酒楼”。^{[7]第231页}

清末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安地区出土了许多唐代墓志，不少学者据之对唐长安城的坊市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出版的由李健超先生编著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可谓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李书于长安西市一节，广征博采，在徐、程二氏旧著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新的资料，其对前人有所补正者，恕不赘述，仅新增者，即有“肉行”、“鱼肆”、“帛肆”、“凶肆”、“饭铺”、“柜坊”及“卖药者”宋清、“西域胡商”与“锦行里”等。^{[7]第232—233页}

从唐人韦述撰《西京记》及《两京新记》，到近年出版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虽然使人们对唐长安城西市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西市的许多问题对我们来说仍然不大清楚。除过应继续搜罗放佚，从历史文献中寻找线索外，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增进对西市的了解。

（二）考古发掘中见到的西市

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在今西安城西南方1公里多的麋家桥与东桃园村之间，即

